

痲弦、楊牧間愛荷華 ——柏克萊兩地書中痲弦愛荷華詩文學活動實況研究

解昆樺

一、書信的文學史勘驗

痲弦作為華語現代詩之經典詩人，且為台灣一九七〇—一九〇年代重要編輯人，在對之的研究上其相關文學資料可稱齊備，然而即使如此這些資料未必能轉化出對之的研究細節。在此我們以其作家年表為例，台灣文學館網站之「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收存系統」即有一痲弦年表，參考了《深淵》（1971）、《痲弦自選集》（1977）、《詩儒的創造：痲弦詩作評論集》（1994）、《痲弦評傳》（2006）、《於無聲處》（2011），可謂縝密。從參考資料之出版年頻率也可見，痲弦確實為華語圈持續關心的詩人，儘管其一生（1932-2024）的詩創作不過集中於1953-1965年這青年而至中年的時光。但也終究說明了其溫柔中隱含機鋒，間或戲劇節奏之詩風，如何跨越時代，誘人一讀再讀。儘管詩人早早因現實勞頓停筆，其後多次在現實編輯事業中找到間隙，嘗試為詩，最後復又頓挫。詩終

為已然絕筆之事業，死灰不復燃。

但這些詳細的痲弦年表「群」，並不能保證事事詳細。以一般兩岸華語文學創作、研究者來說，留學歐美進修往往為生命史要事，因為往往為個人文學創作生涯，甚至是職涯轉變契機。台灣文學館網站之痲弦年表，於痲弦首次出國參與愛荷華大學課程，僅於1966年9月列「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研習兩年。」，而於1968年6月則列「結束愛荷華大學研究工作」。如此列法，回到歷史情境來看，有兩個問題值得細探：

第一、是時臺灣處於戒嚴時期，痲弦當時仍在軍中任職，如何能至愛荷華大學參與「國際寫作計畫」？處理這個問題，馬上就能看到以下令人莞爾關於痲弦資料積非成是的錯用，需要予以糾正——在維基百科中痲弦一目，其生平部分即寫「1966年以少校軍銜退伍，並應美國國務院之邀參加國際寫作計畫訪問兩年」¹事實上透過本文以《痲弦書簡》為研究素材，以書信對比研究為方法，

即可知大錯特錯。但不幸的是，此一錯誤訊息被廣為誤用，例如國家圖書館之臉書專頁於2024年10月13日之【悼念痲弦】即寫為「1966年以少校軍銜退伍後，全心投入文藝事業」²；《鏡週刊》〈台灣現代詩啟發者痲弦離世！享耆壽92歲〉：「1966年以少校軍銜退伍。隨後應美國國務院之邀，參加國際寫作計畫，並訪問美國兩年。」³如此錯誤延用例子，不一而足，不再一一羅列。

第二、痲弦是如何「結束」愛荷華大學研究工作的？原因為何？嚴格來說，他在愛荷華大學的主要工作內容為何？是做研究嗎？

針對以上兩個問題，本文即以洪範出版之《痲弦書簡 I：致楊牧》，對比《楊牧書簡 I：致痲弦》，以為印證討論。在文學史研究意趣上，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末期網路通訊發達之前，除了當面對話、電話以外，手寫書信可說是文學家間溝通最重要的方式，比起聲音、照片，書信中文字紀錄，更貼近於文學家的文字技藝工作形式。在我們這篇痲弦、楊牧間愛荷華—柏克萊兩地書研究之前，另有相關之鍾理和、鍾肇政《台灣文學兩鍾書》，以及鍾肇政、東方白《台灣文學兩地書》。從德勒茲（Gilles Deleuze）「差異與重複」的視角來看，文學家間手寫書

信的往來回覆，其內在生命事件被提出、重述、尋找答案、發展結束，恰恰塑造了一種微觀觀察文學史現場的時間印記與皺摺。

二、《痲弦書簡 I：致楊牧》所呈現至愛荷華大學之準備細節

關於「痲弦1966年9月赴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研習」一事，在《痲弦書簡 I：致楊牧》發徵於1966年3月1日痲弦由復興崗寫信給於愛荷華之楊牧⁴信件中，信件寫道：「關於安格爾教授又要弄一個詩人到愛大事，我於接信後即向有關方面作試探性的詢問，並與橋橋商量，結論如下：1.我願意去。……2.軍職不會影響出國手續的辦理。3.我肯下決心花半年時間惡補英文」⁵這裡已可初見其前維基百科言「1966年以少校軍銜退伍，並應美國國務院之邀參加國際寫作計畫」的退伍之說為錯。事實上，至《痲弦書簡 I：致楊牧》最後關於愛荷華大學一事，為1968年6月30日痲弦從都柏林寫信給於柏克萊的楊牧所寫：「我遲遲其行直到廿八日才離開美國，此所謂相見難，別亦難。」痲弦在美期間，特別後期受到軍職身份影響極大，終而使其無法繼續於愛荷華大學深造，更可見前引維基百科所謂少校軍

1 引見<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98%82%E5%BC%A6> (2024.12.01 查閱)。

2 引見<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HB7kVvq2s/> (2024.12.01 查閱)。

3 引見<https://reurl.cc/5D9DM7> (2024.12.01 查閱)。

4 當時楊牧筆名仍為葉珊，又楊牧本名為王靖獻。

5 引見《痲弦書簡 I：致楊牧》（臺北：洪範，2023年），頁17。

銜退伍參加國際寫作計畫之嚴重錯誤。但嚴格來說，痲弦當時言：「軍職不會影響出國手續的辦理」或許也是過於樂觀，因為從其1966年7月22日從內湖寫給仍在愛荷華的楊牧這封信寫到：

去美事我正在奔波，現公事已達參謀總長黎玉璽將軍的辦公室，預料一兩天之內就可以轉呈 總統批可，批可後馬上辦護照、簽證等手續，如果一切順利，我可望在九月中旬以前到愛荷華。因 軍中留學制度僅限於理、工、醫三科，文法科留學必得 總統特准才行。雖然我這次去並非以留學生的性質的申請，而是以軍官應聘出國任職（中文顧問名義）性質申請，但因為沒有前例可循，依法須呈 總統特准。由此你可以知道我這次去是多麼不容易，多麼「隆重」，如果我去後不好好幹，不好好寫詩，不但對不起安教授、你，轟華苓小姐，對不起我橋橋，也對不起國家。現在我唯一不放心的是簽證，上次我曾要求安哥爾先生寫信給台北的美國新聞處和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說明我此番去美，是作家身份而非留學生，英文不是主要條件……⁶

這封信非常重要，因為呈現了當時痲弦仍有軍職身份，赴美所需要面對的申請困難，主要還是當時軍中留學慣例，乃是限於理、工、醫三科。因此甚至需要送到當時參謀總長黎玉璽將軍，甚至必須呈報當時總

統特准之細節。因此痲弦以軍職赴美國愛荷華大學，應為理論可行，實則為當時軍中特例。但就此來看，也解答了前述第二個提問，痲弦至愛荷華大學乃是「留學」，主要以上課修業為主，儘管廣義來說修課會有研究類型的作業，但終究並非學院角度所謂學者之移地研究。這封信也顯示「寫詩」與「英文」，為痲弦當時赴美後設定之核心要務。特別是前者，就目前後設角度來說，痲弦於1965年停筆，依當時來看，1966年7月決心赴美的痲弦，又何嘗不仍有繼續寫詩的意願呢？

三、《痲弦書簡 I：致楊牧》所呈現痲弦於愛荷華大學之詩創作細節

同為臺灣現代經典詩人的楊牧，確實為痲弦詩壇摯友。痲弦在1966年8月23日寫給楊牧的信件第一點即寫到：「蔣經國部長已批准，並蒙召見，面予嘉勉，一二日正式公文即可發下，拿到公文，就可以辦護照及簽證，如果弄得快，九月中旬左右我就可以成行，乾坤已定，內心之興奮，無法形容。」⁷痲弦赴美後，於柏克萊的楊牧即於《楊牧書簡 I：致痲弦》之1966年10月30日信件中關心：「我總覺得生活寫作第一，別的暫緩無妨，不知道你自覺如何？莊喆說你有詩，大好消息，可以寄來一閱否？」⁸委婉鼓勵之

6 引見《痲弦書簡 I：致楊牧》（臺北：洪範，2023年），頁28-29。

情，溢於言表。痲弦收信後，亦即於1966年11月7日，以長信回覆：

在此看到各國來的作家，一個個頭角崢嶸，出言不遜，好像都有一套，這使我在創作方面的勇氣，反倒有受挫之感。正像一個學聲樂的人到了意大利……頓覺自己要在這樣的背景下脫穎而出，談何容易？但是詩還是要寫的，你對我期望甚大，我不能負你。來此的第三天我便開始工作，用紀德《剛果紀行》的方式記下我在美的行踪和感覺，我散文不行，只能作為個人性的紀錄。關於可能變成詩的那些，我已用散文暫時記下來，或寫下零星的單句，有待改寫整理和擴展，有定稿，即寄你過目。⁹

從痲弦之回信看出，其初到美國時如上述之驚覺，反映了典型異地遷移者的文化與語言壓力。在外國語境中，作家經常感到自己被丟入「他者」的角色，不但要面對國際同儕的競爭，也要消化不同文化帶來的美學刺激與思想衝擊。此種生命斷然發生之「文化位移」經驗，正如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等論述中所強調：離開母國的書寫者，總需要進自我認同的再定義。若進一步以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識／權力」（power/knowledge）概念來解讀，痲弦在面對「各國來的作家」時所產生的「受挫之感」，其

實也牽涉到文學圈中的權力位階。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在這由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所隱喻之「國際化」的文學社群中，各自握有不同程度的語言資本與文化資本，形成微妙的競合狀態。在這樣的場域裡，身為「外來者」的痲弦必須同時面對陌生的語言文化與文壇互動規則，因此產生如此頓挫感。

痲弦在留美愛荷華大學期間，確實有於《幼獅文藝》之第26卷6期（1967.6）發表〈屈原祭〉一詩，《幼獅文藝》第27卷5期（1967.11）發表〈頌歌〉一詩。在此回看台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收存系統」之痲弦年表，出錯有二：第一、於1967年處先列《幼獅文藝》第27卷5期（1967.11）〈頌歌〉，後列《幼獅文藝》第26卷6期（1967.6）〈屈原祭〉，次序出錯，應當調整。第二、1966年列「9月，詩作〈大衣〉發表於《幼獅文藝》第153期」然而筆者檢索《幼獅文藝》該期並未有如此詩作。比起痲弦在愛荷華大學是否續為寫詩，更重要的是痲弦在愛荷華大學進修時，參與國外詩活動時，對臺灣現代詩1960年代詩風的重判，在1966年12月5日寫給楊牧的信中論及：

我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禮堂聽《詩》刊的詩人們唸詩，發現他們使用語言極為平

7 引見《痲弦書簡I：致楊牧》（臺北：洪範，2023年），頁31。

8 引見《楊牧書簡I：致痲弦》（臺北：洪範，2023年），頁38。

9 引見《痲弦書簡I：致楊牧》（臺北：洪範，2023年），頁35-36。

淡生動，不難懂，也不咬口，要不然在座的五百多聽眾不會那麼如醉如狂，完全被一張嘴一首詩所控制。這種情形，在台灣的寫詩朋友絕難想像。我們是不是新得太過份了，矯枉過正的象徵主義和技巧主義已把我們的詩刊搞得不像樣子。我想我們是錯了，今天的問題還不在現代詩背離群眾，而在於背離生命？！……如果這樣下去我寧可回到艾青和田間。¹⁰

痙弦在這段書信中，顯示出對臺灣一九六〇年代現代詩運動的強烈反思，也透露出他在美國真正面對西方詩歌現場後，出現了理論與現實間的落差感。當他聽到《詩》刊詩人以「極為平淡生動」的語言朗誦作品，卻能使現場五百多位聽眾「如醉如狂」，他不禁比較臺灣詩人往往熱衷「過度新奇」與「技巧化」的表現方式。這種「矯枉過正」使詩創作似乎陷入一種表面語言賣弄的困局：詩語言變得艱澀，甚至脫離了生命本質的直接性。對痙弦而言，西方詩人之所以能以平易的文字撼動讀者，根本原因或許並不只是語言的「簡單」，而在於創作者是否真正掌握了詩的內在靈魂，懂得以作品去呼應生命的多層次感受。

然而，當痙弦感嘆自己寧可「回到艾青和田間」一大陸華語口語化詩作的範例時，也說明了他在理論吸收與實際創作之間的掙扎。臺灣現代詩受到法國象徵派與超現實派

影響，由此帶來的陌生化與象徵技術，並非全然無效，只是經由某些詩人的過度操作形式流弊。痙弦從海外的詩活動中看到了歐美更多元的風格，也意識到西方理論能帶來的思想刺激。他同時注意到：如果理論只是被快速拼貼到詩句中，而缺乏紮實的情感或生命體驗作支撐，便容易淪為「只是在造句」的膚淺模仿。究竟詩人在吸收西方理論之後，能否在自身詩作中真正內化、激活生命的厚度，而非僅停留在詞藻的翻轉或技法的炫技——這才是痙弦在美國實地觀摩後的最大思考命題。從這角度看，他的擔憂更像是一種創作良知的回響：西方詩傳統能提供觀念與實驗，但最後仍需回到寫作者自身對世界、對人生的直接對照與琢磨，才能免於一味追逐新奇而失去了詩最初的生命溫度。

四、《痙弦書簡 I：致楊牧》所呈現痙弦於愛荷華大學之外語文學課程參與

至美留學後，英語書寫始終是痙弦的重要挑戰，誠如其於1967年8月24日寫給楊牧信件所提：「我一個人也夠苦的，夏季學校剛完，又參加英文補習，每天文法習題一大堆，頭直發疼。我不怕英文，只怕文法。」¹¹但痙弦「既以決定，就拼定了」¹²始終不氣餒，保持拼勁。最後也獲得不錯的成績，因此「第一學期的成績單已發下，我複

10 引見《痙弦書簡 I：致楊牧》（臺北：洪範，2023年），頁40。

印一份給你倆，算是對老友的交代」¹³成績如何？楊牧1967年9月6日的回信，為我們解謎：「你的學業成績顯然令人感動，這個成績一定花了你許多時間和精力，也難怪你没寄詩來，寄了許多A來。」¹⁴

我們這裡要觀察的還在於痲弦於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之外語文學課程的參與狀況。從與楊牧之書信來看，詩作的翻譯顯然是其重要的功課。從1966年11月7日寫給楊牧的信中就提及：「安格爾常常提起你來，得意的要命，我詩之英譯，他說你譯得好。」¹⁵可見在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的課程中，文學作品翻譯為重要課程。翻譯在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中之所以如此受重視，正因它不僅是一門技術，同時也是連繫多元文化、拓寬創作視野的關鍵橋樑。對於像痲弦這類非英語母語的詩人而言，翻譯所帶來的不單是文法與詞彙的磨練，更是對自身創作語言的再認識。正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巴別塔論〉（Des Tours de Babel）中強調，翻譯並非將文本「完好無缺」地搬運到另一種語言，而是一種在多重語境間，進行遊移，甚至有無意識間地重構意義的過程。透過翻譯，創作者得以重新審視母語文字的可能性，經由切換至英語或其他外語的視角後，再回頭審

讀自身的作品，往往由此能激發出突破既有框架的詩意靈感與語言技巧。

更細部來看，確實痲弦1967年8月24日寫給楊牧信件，提到了自身的翻譯詩功課：「我試譯了一首詩，寄你過目，請把譯錯及不妥的地方全部改正並加潤飾……這首詩即時下流行的『對話體』，句子平淡稀鬆，句子背後似有所指、所諷。這種辦法也不錯，台灣確沒有這路子的。但此詩不是好的例子。不太好譯，作者用的英文是打碎了的口語。」¹⁶這個資料或許可以解讀，這樣口語詩作較適合當時痲弦處理，但也應該與前述1966年12月5日寫給楊牧的信對於口語與臺灣一九六〇年代現代詩晦澀詩風意見並看，這首對話體、口語化的英語詩在翻譯過程中，或許給了痲弦一種跨文化調度的靈感：如何將外國文本中的「平易近人」與「隱含諷喻」並存之妙，嫁接到中文創作裡；同時也讓他意識到母語本身並非桎梏，只要能重新審視語言與文化的角度，就能在「平淡」與「深刻」之間找到動力與空間。也正因此，痲弦在美國時期不僅反思一九六〇年代台灣現代詩的不足，也不斷思考如何藉由「翻譯與創作對看」的方法，走出一條兼具美學追求與廣泛共鳴的詩之路。這些在信件中斑駁出現的蛛絲馬跡，充分顯示了他對口

11 引見《痲弦書簡 I：致楊牧》（臺北：洪範，2023年），頁60。

12 引見《痲弦書簡 I：致楊牧》（臺北：洪範，2023年），頁48。

13 引見《痲弦書簡 I：致楊牧》（臺北：洪範，2023年），頁61。

14 引見《楊牧書簡 I：致痲弦》（臺北：洪範，2023年），頁91。

15 引見《痲弦書簡 I：致楊牧》（臺北：洪範，2023年），頁36。

16 引見《痲弦書簡 I：致楊牧》（臺北：洪範，2023年），頁60。

語詩與象徵技術各自邊界的考量，最終都是為了回歸這句「問題還不在於背離群眾，而是背離生命」的自我提醒。

五、小結

從痲弦1967年8月24日、8月28日寫給楊牧的兩封信件也可見，軍職身份影響了他在愛荷華大學的繼續學習，主要乃是痲弦持有的是官員護照，使他終不能通過移民局的護照加簽，無法以學生身份在註冊。而於1967年9月12日給楊牧的信件中提及：「我久無作品，是相當嚴重，好則秋天起我已被拒註冊，而時間還有一年好待，總會寫一些的。另外，對英文的興趣越發濃烈了，我試譯了一些詩。」¹⁷而1968年6月30日寫給柏克萊楊牧的信件，已從都柏林發出。痲弦終究告別了美國愛荷華，中斷了「國際寫作計畫」，去尋訪他一九五〇年代「斷柱集」系列詩作，那些他想像過卻未抵達過的歐洲。

最後，筆者想指出，若細部翻閱《痲弦回憶錄》，可以發現其中痲弦極少提及過其愛荷華大學之經歷，但關於愛荷華大學留學之行結束後，倒有一段記述：「《國父傳》演出結束後，我接到了愛荷華作家工作室的邀請兩年，兩年後結束研究回臺，不到半月，受到救國團主任蔣經國召見。……蔣經國與我交談後，讓我在他主持的『救國團』

周會上針對美國青年文化做一次報告，並讓我事後寫個文字材料交他。」¹⁸可做為痲弦1960年代中末參與愛荷華大學此一文學生命歷程之餘緒。

綜觀痲弦在愛荷華大學的留學經歷，可以說是他在軍職身分下，於戒嚴體制外首次透過跨國移動，獲得的最大文學養分，同時也埋下日後編輯生涯的重要伏筆。若僅依賴「年表」「回憶錄」或官方相關網路資料，常常只看見簡要的「1966年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愛荷華」與「1968年結束兩年研習」兩大時間點，卻未能呈現他在軍官護照、簽證制度下，為了繼續學習與創作而奔波的種種細節，也忽略了他對美國詩壇「平易直白」之啟示的個人思考，以及面對台灣現代詩過度技巧化所提出的省思。

本文以《痲弦書簡 I：致楊牧》與《楊牧書簡 I：致痲弦》的互文對讀為基礎，重新檢視當時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中痲弦的各項重要環節：他的軍職身分在行政程序上形成的阻礙，他對「英文文法」的執著與苦讀，他在面對美國詩歌現場時所產生的文化位移與受挫感，以及他對台灣一九六〇年代現代詩風「矯枉過正」的寫詩方式所做出的反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件中談到的詩歌翻譯課程，並非僅是文字轉換的技巧訓練，更幫助痲弦深度檢視母語與外語系統的複雜對應，激發他在「平淡」與

17 引見《痲弦書簡 I：致楊牧》（臺北：洪範，2023年），頁66。

18 引見《痲弦回憶錄》（臺北：洪範，2022年），頁177。

「象徵」之間尋找創作張力。也因此，他不斷提及「不要背離生命」，說明他同時看重詩歌的可讀性與價值深度，而非單純地否定現代主義或附和口語化潮流。

整體而言，透過痲弦與楊牧間書簡的蛛絲馬跡，本文還原了痲弦因軍職限制前後奔波所構成的留學軌跡，同時糾正了相關網路文獻中廣泛流傳的「1966年少校退伍赴美」等錯誤資訊，以及台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收存系統」之痲弦年表相關錯誤。進一步證明文學家書信在文學史研究中的獨特意義。相較於一般年表或個人回憶錄，信件能更即於當時、細節化地反映當事人的所思所感，也能在誤傳或資料不全時，提供關鍵的事實線索。這些細節對於痲弦何以在愛荷華能同時完成思考轉向、挑戰詩歌創作、並最終面臨簽證受阻而返臺，都有明確的說明作用。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痲弦與楊牧書信也成為一個時代的縮影：在臺灣仍處於戒嚴與封閉管制之際，一位軍中文人如何踏出國門，直面多元的海外詩現象，並在文化激盪中反思本土創作的侷限。正因如此，痲弦在信中反覆談及的「背離生命」警語，才得以跳脫單純的詩學技術討論，回歸到詩與作家本身的內在動力。或許也正是這份面對現實與自我掙扎的態度，使他日後能在編輯工作與文學評論的領域裡，持續貢獻溫厚的思想與眼光。對於任何後世研究者而言，這些信件不僅是一手史料，更蘊含了文學家在特殊時空縫隙，如何堅持創作、如何在跨文化

對照，找尋詩人寫作精神之所存在的動人軌跡。

七、參考文獻

- 楊牧《楊牧書簡 I：致痲弦》（臺北：洪範，2023年）。
- 痲弦《於無聲處》（香港：明報月刊，2011年）
- 痲弦《深淵》（台北市：晨鐘，1977年）。
- 痲弦《痲弦自選集》（台北市：黎明文化，1977年）。
- 痲弦《痲弦書簡 I：致楊牧》（臺北：洪範，2023年）。
- 痲弦口述；辛上邪記錄《痲弦回憶錄》（臺北：洪範，2022年）。
- 蕭蕭主編《詩儒的創造：痲弦詩作評論集》（臺北市：文史哲，1994年）。
- 龍彼德《痲弦評傳》（臺北市：三民書局，2006年）。
- 鍾理和、鍾肇政《台灣文學兩鍾書》（臺北市：草根，1998年）。
- 鍾肇政、東方白《台灣文學兩地書》（臺北市：前衛，1993年）。
-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文化與帝國主義》（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2001年）。
-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書寫與差異》（臺北市：麥田出版，2004年）。
- 德勒茲（G·Deleuze）加塔利（F·Guattari）《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